

THE "BROKEN" HISTORICAL NARR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A STUDY ON THE NEW HISTORICAL NOVEL WRITING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

『断裂』历史叙事

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

陈娇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29215

I207.42

73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

『断裂』历史叙事

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

陈娇华◎著



THE "BROKEN" HISTORICAL NARR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A STUDY ON THE NEW HISTORICAL NOVEL WRITING

3207.42
73



北航

C16376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陈娇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61-1850-4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历史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176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门小薇
责任校对 陈 莲 王素新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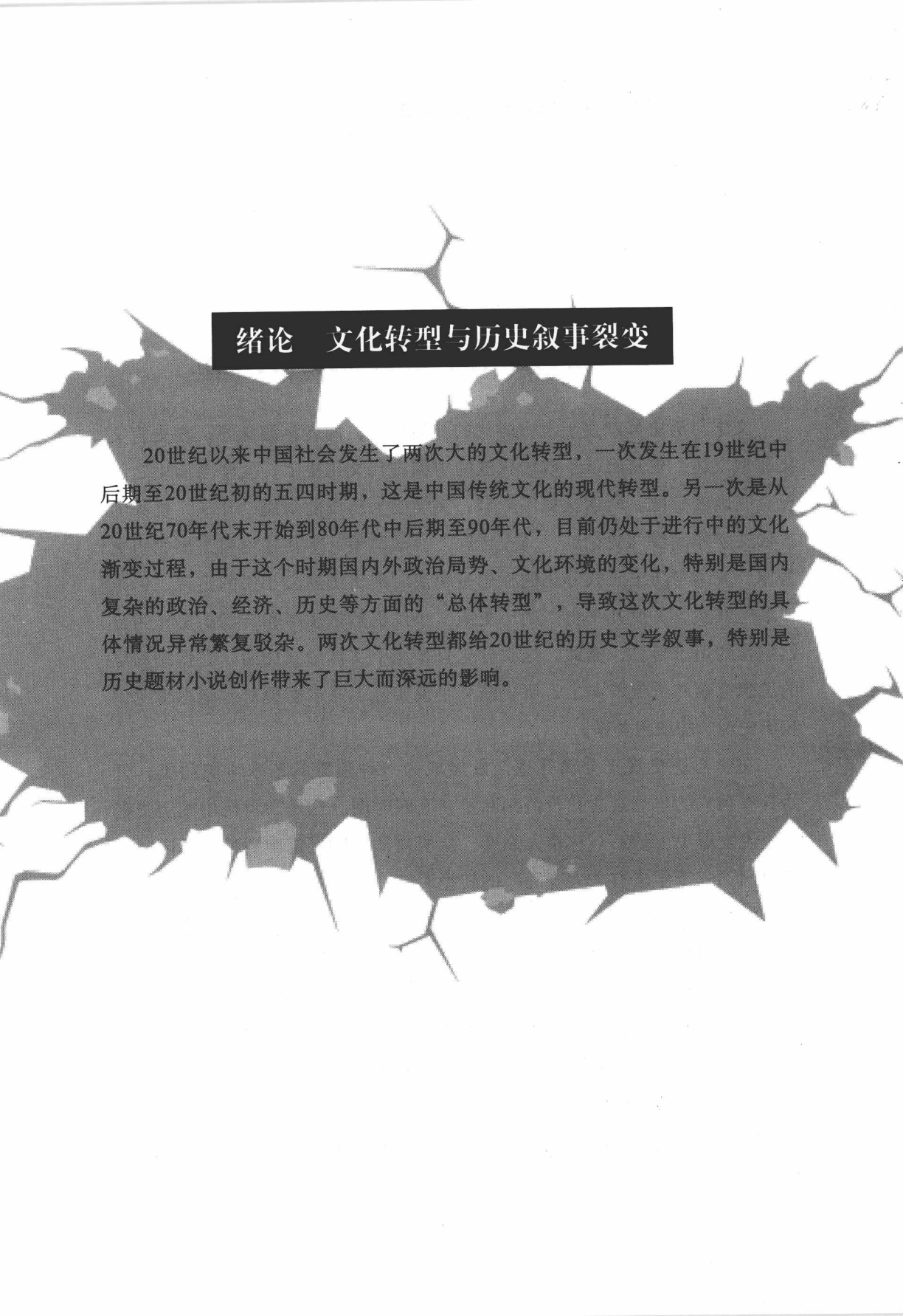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34千字
定 价 3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论 文化转型与历史叙事裂变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大的文化转型，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次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目前仍处于进行中的文化渐变过程，由于这个时期国内外政治局势、文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总体转型”，导致这次文化转型的具体情况异常繁复驳杂。两次文化转型都给20世纪的历史文学叙事，特别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现代文化转型与理性历史叙事确立

文学与历史都产生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两者渊源深厚。在史官文化非常发达、史官服从于政治权威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文学与历史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谓文史不分家，文学沦为历史的附庸、仆从。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像《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往往也是杰出的历史著作。文学与历史正式分化的标志是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出现。但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历史演义小说仍然把演绎和传播历史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目标，因此，这次分化只是流于文体形式层面，在作品深层的思想意蕴和价值取向上，历史演义小说实际上并未摆脱对封建思想意识和历史观念的依附关系。

文学与历史真正分离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审美门类，开始具有独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是在五四时期。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裂变。众所周知，19世纪中后期至五四时期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发生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数千年来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古老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推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此天朝大国的迷梦被打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文化以其巨大落差被醒目地凸显在国人面前。在一种强大的认同危机和发展焦虑促使下，中国开始了从物质技术、社会制度，到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继而引发声势浩大的以思想启蒙、价值重估为主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化，由传统文化观念转向现代文化观念，“提出并自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目标，以之批判并取代

把人的道德性实现视为人的本质的封建观”^①。这一切必然带来整个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历史观念等方面的根本性裂变。

王富仁指出，近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虽然出现空前繁盛状况，但是与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相比并未发生质的飞跃，没有出现超越《三国演义》之作。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出现独立的、全新的历史观念。五四时期，随着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大潮叠起，来自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哲学等各种思潮蜂拥而至，给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带来很大影响，涌现了几种富有代表性的历史观念，给现代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比如受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影响，出现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农民起义题材历史小说；受陈独秀的反封建激进思想观念影响，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反抗偶像权威、追求个性解放的抒情性历史小说；以及鲁迅在重视人类生命力和创造性活动的历史观念指导下创作的文化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故事新编”式历史小说^②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历史题材小说，不论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是以确定性的时空构架和线性因果时序传达一种与古代、近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循环论历史观念截然不同的必然性进步——发展历史观念（即进化史观）。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一种“现代观念”，它掐断了过去循环式的时间圆圈，使之“折成一条箭头向前或向上的直线或螺旋线”^③，同时预设了“社会向善论”、“人性将不断改善、趋向理想人格”以及相信人的理性、力量、知识及认识能力等将不断提高^④等理想观念。这种线性发展理性历史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成为大多数作家观照历史时所遵循的普遍价值原则，也由此“生发出‘进步—发展’总模式之下的一些亚模式，诸如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改革与保守模式。……在此情形下，时间的状态是事物由低

① 高瑞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② 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3期。

③ 黄子平：《“灰阑”中的历史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

④ 高瑞泉：《论“进步”及其历史——对现代性核心观念的反省》，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6期。

4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 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

级向高级发展的自我完善状态，即渐进状态；时间的演进必然伴随着事物的变化，即体现着社会历史的规律”。而“‘规律’即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时间的推移，也即文明的进程。在这一模式中，时间具有了有起点、无终点、渐进的与开放的特征，而且，它通常指向未来，即历史发展的方向性”。^① 联系中国现代、当代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实际，不难发现这种理性历史观念一直主宰着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现代历史题材小说到80年代中期之前的新时期初历史题材小说（包括“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形成一种统一的整体化的理性历史叙事模式。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至新世纪初，大多数正统历史小说创作（包括传统历史小说和新革命历史小说^②）也依然延续和贯穿着这种“进步—发展”史观（不过已由过去的社会政治进步观变成思想文化进步观或者是两者的纠合）。

同时，五四时期现代历史题材小说所开启的创作传统，即强调文学的社会启蒙效用也被沿袭下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发生根本性变化。五四时期，为了建构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体和民族国家主体，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与其他文学门类一样得到大力倡导和发展，并承担起思想启蒙和扩大新文学战绩的历史重任。从此以后，中国现代、当代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便一直在阶级解放、民族独立、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文革”后，新时期文学在努力冲破极“左”文艺思想束缚的同时，以对历史伤痕的深刻揭橥和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重树知识分子的信心和社会公众意识。尽管作家们在极“左”年代里遭受过非人磨难，有的甚至曾一度被打入社会底层，剥夺了做人的资格，但重返当代文坛后，他们依然心系未来，自觉地以人民代言人和社会良知自勉，在努力复活“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同时，也担负起推进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使命。比如高晓声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时说道：“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

^① 张鸿声：《时态呈现与历史观的表达——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学的一种考察》，载《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

^② 新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涌现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相比，在文学观念、形象塑造及美学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① 形象地概括了当时“归来作家”们的共同心声和坚定信念。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同样如此。作家们自觉地投入到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大潮中，以“反封建”思想主导创作，积极承担起思想启蒙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使命。比如一位作家这样强调过：历史小说“如果反映不出这个主题（即反封建）来，就不是优秀的历史小说，就是没有完成一个有觉悟的作家所肩负的任务”^②。这个时期涌现的大量历史题材小说，像《李自成》、《星星草》、《风萧萧》、《九月菊》、《天国恨》等都是这种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等作用的产物。

总之，新时期初及此前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注重贴附现实（历史）经验生活层面、强调在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启蒙宣谕和教育认识作用。在艺术审美层面上，由于现实主义概念本身“具备一种根性（真实性），维持着人对世界的一种基本的言说方式”^③，即隐含一种对于真理、真实性的内在诉求，因此，“历史真实性”原则和现实主义再现论成为统驭这个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主导理念。事实上，这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传统的一个深化和承传。“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主义”这种文体形式有一种所谓“想象性认同”，即无意中把“现实主义”看作一种文学参与历史建构、启蒙大众进化的审美形式。因此，那一代作家都力图以文学承担起审美拯救使命，自觉地选择现实主义^④。而现实主义的全知叙述和完整性情节构建也保证了历史再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完成对于思想意义和价值观念的传达。然而，这种统一的整体化理性历史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却遭到巨大冲击，并产生裂变现象，由过去一体化的以再现“历史真实”为创作旨归的正统历史小说，包括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裂变为完全背离“历史真实

① 高晓声：《生活·思考·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② 转引自吴秀明《世纪交替的历史关注与现代性求索》，载《福建论坛》2002年第4期。

③ 尹昌龙：《重返自身的文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④ 周志强：《重写“20世纪”——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与文体形式》，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6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 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

性”原则的新历史小说与继续坚持和深化“历史真实性”原则的正统历史小说（包括传统历史小说和新革命历史小说）。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重大革命性变化，它发生在本时期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次文化转型的一个产物。

第二节 当代文化转型与一体化历史叙事裂变

要真正理清这次历史叙事裂变现象发生的原因、具体情况及其带给日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启示意义，我们先得从本时期文化转型的现实语境入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以来的这次文化转型（也叫当代文化转型）是基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现实环境的复杂变化，特别是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及科技的发展、变革等内在需求的。国际上，80年代末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解体，结束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垒的“冷战”局势，“破除了‘政治神话’和‘意识形态神话’，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政治性思维作为国家民族和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际间的阵容和各种利益集团”^①，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学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在国内，1989年前后发生的“政治风波”、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转型及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等等都冲击着在新时期初期即80年代初所重建的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理想与信念、乐观与自信等，给他们的内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失落和迷惘情绪。特别是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合法性的确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消费文化的发育成型，不断发展和膨胀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世界观和历史观等产生强劲冲击与影响。如果说在80年代，“知识分子对计划经济的挣脱、对市场经济的向往，是与‘新启蒙’和‘纯文学’的核心价值相吻合的，通常把市场视为自我实现、民主自由的‘归宿’。那时对市场经济的想象和向往忽略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给人带来的负面影

^① 王岳川：《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响”，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性合法性的确立，商品经济逐渐在全社会得以铺展并不断膨胀，与之俱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意识形态则“不仅世俗地解释了知识分子倡导和坚守的那些精神准则，而且彻底冲击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现代化想象中确立的身份和话语权以及知识分子曾经具有的普遍意义”。^① 此外，这个时期从国外传入的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及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严重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心理情绪和世界观，以及他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徐坤回顾自己1989年前后的心理变化时说：“那阵子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和许多人一样一时难以适应，可以说切身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失落，原来做学生时一些想法、抱负、理想之类的，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人心里感到很灰的，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② 尤凤伟在谈到“八九事件”给新时期文学发展带来的一些波折时 also 说道：对于作家群体来说，这个“事件”使得作家发生了“飞鸟的情况”（即逃逸现实），当然，“只是逃逸的不是形体，是精神。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了茫然，感到无望，一度对自己多年形成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怀疑。……作家们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力图扮演‘医生’、‘法官’和‘代言人’的角色，然而现实却给他们‘告诫’，使他们意识到那仅是作家的一厢情愿，生活并没有因有那么多‘深刻’小说的干预而改变步履，不良也并没有因为文学的不断批判而有所收敛。于是只能以退为进，回归文学的本土”^③。外部世界性语境的剧变和内部心灵境域的裂变，使得作家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和新的心态看待过去、现在、未来的人和世界。“历史的终点和起点凝聚起一个巨大的历史寓言，同时也将一种空前的历史困惑和价值分裂留给了90年代的人们。”^④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与过渡就是在这种背景、氛围和情绪之中徐徐地拉开了大幕。

① 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② 林舟：《生命的摆渡》，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③ 王尧、林建法主编：《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讲演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④ 王岳川：《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所谓文化转型，主要指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的新旧交替与渐变过程，即“我们所处身其中的整个社会文化方式所发生的整体性、结构性的转换和变动”^①。对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转型，研究者谈论的比较多。比如王岳川的《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就从西化意识、知识分子立场、对现代化的态度、主体性及本体论等方面比较了90年代与80年代话语形态的不同，认为90年代的文化氛围与80年代相比有了相当的差异，人们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看自身70年代到80年代那种‘前现代’与‘现代’杂糅性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以一种逆反性的眼光重新审理80年代启蒙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启蒙与建构、理想与轰动的若干问题，审视在坚持改革开放开窗开门接受西方新的思想，并把西方的社会思想民主自由引进以后，到底哪些思想预言应验了？哪些将自己引入歧途？哪些思想文化和意识话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对自己仍然具有启迪意义？而哪些却在历史的误读和现实的错位中被时间淘汰而成为明日黄花？”同时还从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及金钱神话等方面探讨了90年代文化转型的深层问题，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再也不可能闭关锁国而独立于世界之外，而只能参与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这个世界充满了生存风险和自我身份焦虑，也充满了东西方社会的互动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性”^②等等。张法、张颐武和王一川的《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也阐述了90年代的文化转型问题。他们从中国大陆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港台文化互动关系的加深、当代主流文化自身发生的适应市场化的转变等两大背景分析入手，指出90年代文化是“新保守主义”、“新启蒙主义”和“新实用主义”并存的多元价值取向^③，等等。

综上所述，当代文化转型的主要特征是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芜杂性。具体来说，即既不是古代社会那种封闭单一的传统文化观念（尽管传统文化也是复杂多样，包含儒、道、法、释等诸家，但儒家文化

① 陈旭光：《文化转型中的第六代导演》，《北大讲座》（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同上。

③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的正统和主导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也不是“五四”以来那种强调以西化为主流的现代文化价值取向（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这种主流倾向会出现中断现象，但是整体性的现代化追求仍是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主脉），而是呈现出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及后现代文化等多元文化芜杂并呈状貌。换句话说，“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现代启蒙文化受到质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作为应对全球化和商业化现实开始得到重新审视和认同，后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作为商业社会的流行元素也得到肆意膨胀和发展。这种多元驳杂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构成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所直接面对的现实。它突破了自“五四”以来单一的强调向西方学习借鉴的现代化（包括弘扬个人主体和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主体）文化价值取向（尽管在极“左”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这种西化取向一度被中断，但是回首20世纪整个历史，不能不说“现代化”一直是主流价值取向，不论是“启蒙与救亡”的世纪思潮总揽，还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文学主题概括，抑或是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政策思路倡导等，都无不印证着这种单向度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对现代性的追求中夹杂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告别了知识分子孤芳自赏式的精英文化自恋状态，流露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谋、雅俗合流的文化市场化和商业化倾向；打破了一元化的现代理性价值观，呈现出现代理性与后现代非理性相杂糅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

正是这种纷繁驳杂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强劲影响，导致以往统一的理性历史叙事开始分裂，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发生根本性裂变。这里用“裂变”而没有用“断裂”，是考虑到这个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发展的复杂状况：既存在对“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理性历史叙事深入发展的传统历史小说和新革命历史小说，如唐浩明的“晚清名臣儒士”系列（《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倾城倾国》）及《梦断关河》、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传统历史小说，以及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我

10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 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

是我的神》，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等新革命历史小说；也存在思想主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历史观念等方面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理性历史叙事几乎完全悖反、断裂的新历史小说，如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苏童的《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陈忠实的《白鹿原》，格非的《迷舟》、《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等。后者正是本书主要研究的对象。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曾经用“断裂”概念来描述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认为当下社会处于“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断裂的社会状态不同于多元社会，“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结构分化瓦解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观甚至相互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①。笔者认为以这个意义上的“断裂”概念为参照来考察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状况，也是比较适当、合理的。如果说主导以前或者本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以来）的理性历史叙事（包括传统历史小说和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思想、文化价值及历史观念的是现代启蒙思想观念，那么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情况则复杂暧昧多了：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上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相杂糅；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是前现代（即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相交织（当然在新历史小说创作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因此，“断裂”在此具有双重含义：一是通常意义上的对以往历史叙事发展逻辑与趋向的一种打断与颠覆；一是指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文学创作观念与思潮的拼贴与叠合。反映到新历史小说创作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话语形态的虚化与蜕变。由

^①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4页。

于历史本质观念的解构，历史叙事化了。新历史小说创作由以往的对历史真实性的求索发展、蜕变为对审美话语形态的探索实验或者是对终极话语（即人类生命、存在等）的思考和探究，历史本体虚化为审美载体，出现背景化的革命书写、欲望化的爱情书写和寓言化的家族书写等。其二，主体性的暧昧不明与模糊游离。由于理性历史观念的消解，价值意义的失落，建构在本体论基础上的主体自然也模糊飘忽和暧昧不明。其三，碎片化的唯美诗意。由于整体性的历史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分崩离析，新历史小说的艺术审美自然只能呈现为零散的碎片诗意而已。这是本书写作的主体构架。同时，论著还将深入探讨新历史小说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所发生的蜕变与回归趋向，及其提供给新世纪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启示价值和意义。

第三节 新历史小说创作的源起与概念界定

一 新历史小说创作的源起

关于新历史小说创作的源起，研究者谈论较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外来思想观念和哲学思潮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拓展，西方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形成于其基础之上的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纷纷涌入国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心态和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到创作。张清华认为，结构主义的理论启示对于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出现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新历史主义作为独立的理论方法在80年代中后期尚未得到译介和关注，但是其基本方法和哲学基础，即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却已对中国当时的学术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也“影响到了当代中国文学中历史与文化意识的更新”^①。崔志远也指出新历史小说的出现与新历史主义影响有关，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消费时尚

^① 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载《钟山》1998年第4期。

12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

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

和世俗化时尚则为作家们接受新历史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①其二，当代社会现实语境的作用。吴义勤认为新历史小说的出现与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有很大关系。“1989年的社会动乱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随后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文化审查，客观上也使中国加入了全民的大反思。作家们从‘五四’以后得到培养而加强的政治归附心态，也因文化氛围的过度紧张而恐惧、徬徨。文学再次面临着存在方式的选择。”新历史小说创作实际上“隐含着对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潮的回避和逃遁”^②。赵联成也认为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出现与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急剧加快，面对滚滚商潮中物欲横流、价值失落与文化失范的尴尬，越来越多的作家都有一种无力进入现实深处，无法把握和表达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无从把握当下生存本相的困惑与隔膜。于是遁入历史、解构历史，并以复活“我心中的历史”来填补现实的空缺和表达对于世界的困惑迷惘。^③其三，新时期文学思潮发展蜕变的结果。陈晓明认为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是新时期文学反思历史走向深入的结果。80年代文学经过短暂的“修复历史的叙事”后，进入到“反省历史的叙事”，再到“对历史本身进行直接的和观念的质疑”。到90年代初，随着整体性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出现了重审革命历史年代的故事，如《相会在K市》、《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等，于是“对直接历史的审视必然导向对历史观念本身的质疑”^④。孙先科也认为新历史小说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出现裂缝和作家文学编码意识加强的前提下出现的，其直接的思想源头是“‘寻根小说’对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弃而亲和世俗性、‘史’性题材的倾向；‘先锋小说’的文本戏拟、对意义消解的倾向以及‘新写实小说’向世俗性价值妥协退让的趋势”^⑤等等。可见，对这些方面研究

① 崔志远：《新历史小说的“碎片写实”》，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② 吴义勤：《“历史”的误读——对于1989年以来一种文化现象的阐释》，载《文艺评论》1993年第4期。

③ 赵联成：《历史母题的解构——新历史题材小说论》，载《当代文坛》1997年第1期。

④ 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⑤ 孙先科：《“新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载《当代文坛》1995年第6期。

者多有涉及，但缺乏细致深入的系统化整体研究，特别是对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即从新时期文学创作思潮演变角度考察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源起，更是显得粗疏、笼统，主要从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来探讨，相应地缺乏从文学自身观念、思潮及创作本体的演变来进行的具体阐述。在笔者看来，这些对于深化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及从文学史角度给予新历史小说创作以恰当评价却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任何创作现象的出现都是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一个结果，而且对任何文学创作现象的研究也只有放置到整个文学思潮发展史中进行，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公允，且符合创作实情的看法与评价。在此，笔者准备着重探讨这个方面。

新历史小说创作滥觞于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和乔良的《灵旗》，在新时期文学思潮发展史上位于寻根小说之后，与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几乎同时出现、并行发展。它的出现是新时期文学创作思潮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它是新时期文学进行历史反思的延续和深化，是思想解放和对人的认识走向深入及创作自由的一种反映。新时期文学是在对“文革”历史伤痕的感性控诉中开始艰难起步，其创作最初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随后出现的反思文学则把新时期文学创作发展推向深入，它是“对伤痕文学的一次否定，并且经由否定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不仅“意味着题材领域的扩大和作家艺术视角的转移”，还使文学由关注外在感性事件，揭发伤痕等转向追根溯源，反思历史与自身，“外在的伤痕延至内心的伤痕，心灵世界的楔入，人的形象逐渐凸立起来”^①。文学的主体性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并走向深化。而且，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历史伤痕的揭发和反思逐渐走向深入，“文革十年”历史、当代“十七年”历史、现代范围的民国历史及近代、古代历史等都逐渐跃入作家反思和审视的视阈内。同时，反思的力度也随着人道主义启蒙话语及人学观念的深度开掘而逐渐加深，非理性的人本领域逐渐得到重视 and 关注。

另一方面，经典现实主义“真实观”的质变及其所引发的关于“现

^① 王东明：《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新时期文学散论之一》，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5期。

14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

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

实”、“生活”、“历史”等概念的相应变化，也是导致新历史小说创作出现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新时期文学是从眼泪汪汪的揭瘡伤痕开始的。“伤痕的真实性和反思的深刻度成了文学的创作圭臬。与此相应，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势不可挡的力量一下子击败了虚假得不能再虚假的浪漫主义和庸俗的阶级斗争工具论。”^① 开启了这个时期文学对于“五四”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超越性回归。可以说，一直到1985年之前，主导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经典现实主义的统治地位都没有动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前期改革文学都依然是在以往的创作惯性上滑行，“思想的惯性、思维的惯性、语言的惯性共同铸造了一种‘时代共名’，其具体标志就是与政治惯性的高度汇合、过去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个人声音被集体言说惯性的淹没、现实主义大潮的惯性式重新确立……”^② 真实性、典型性和本质论仍是文学批评研究中的关键词。据论者考察，“真实性”概念最早出自西方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古典主义视生活为艺术的唯一范本，认为艺术品是作家对生活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其功能主要是给人以求知的满足，因此，它们就把艺术作品中的描写与实际生活的一致性作为衡量和评价艺术真实性的依据和标准^③。M. H.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也谈到：16世纪到18世纪的理论家们认为“艺术即模仿，多少像一面镜子。这一比喻的好坏姑且不论，它在客观上使人将兴趣集中于作品的题材及其在现实中的种种原型之上，而相对忽视了艺术传统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单一艺术作品的内在要求，忽视了作者的个性”^④。20世纪中国的经典现实主义沿袭这一模仿、再现现实的真实观，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存在一个客观必然的历史（现实）真实，而创作就是透过种种生活表象来反映和逼近这种真实，并揭示其本质与发展规律。这一过于倚重经验生活（原型）的反映论创作观，导致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

① 李劫：《略述新时期文学的两次裂变》，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5期。

② 吴义勤：《纸上的火光》，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③ 王元骧：《艺术真实的系统考察》，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④ [美]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